

雲門舞集

流浪者計畫

我要到遠方去 雙手插入漏底的口袋
外衣也磨損襤褸了 我踽踽青空下
繆思，我效忠您

韓波《我的流浪》

第二屆「流浪者計畫」獲獎助者旅行採訪實錄

八名獲獎助者

許育榮、吳耿禎、鄭宗龍、張政緯、陳眉伶、吳文翠、薛美華、達比烏蘭·古勒勒，
於二〇〇六年順利完成旅行。

以下八位流浪者的旅行故事，由首屆獲獎助者謝旺霖擔任採訪撰寫文章



在紙上剪故事的大男孩

到陝北窯洞生活的吳耿真

我要一張很大的紙
我要一把很大的剪刀
細細地剪出心中那片森林



吳耿真作品／手槍娃娃

這是吳耿真寫的詩句，像極一個在蒼穹下仰望星空的男孩，真誠訴說著自己的夢想。時常到了深夜，他手中仍持著三折五折的紙張，指頭繞著 OK 繃，腳下落滿了碎紅花，直至天明才將折紙攤開，掛在窗上，俯仰紙張與光影間的親吻和對話。

對於剪紙，吳耿真有種過人的執著。當現代社會已把剪紙視為落後的手工藝，他卻才開始學習剪紙；當剪紙的老一輩已逐漸凋零，幾乎找不到學習的對象，他仍執拗地選擇剪紙作為生命和藝術的表達。儘管受的是建築學嚴肅的空間概念訓練，他總極力想融合這兩種大相逕庭的技術為一體。

大四那年，他來到台灣尚還保存剪紙文化的馬祖，在西莒島一處廢墟，他利用剪紙融合複合性媒材，做窗、門、玻璃、標牌等。那次實地經驗，他認識許多到垂暮之年卻仍努力剪紙的老婆婆，讓他覺得對剪紙文化有必要去做更多探索。

想不到這個「想法」，隔年就成真了。二〇〇六年他獲得雲門基金會「流浪者計畫」獎助，走訪陝北剪紙文化的原鄉。出發前，有一位在北京大學念人文研究的台灣學生對他說：「現在大陸早已瀰漫勢利的氣氛，哪有什麼傳統原汁的文化存留，還去幹啥？」不過，從來沒有出過國的他，反倒滿懷樂觀認為，若沒有親自走一遭，怎會知道沒有呢。

體會艱難生活中所淬練的藝術力量

首站吳耿真先到達西安，立即就受到文化的震撼，「千年古都內，竟會有 CUCCI、PRADA、ARMANI 專門店，怎麼想也難以跟兵馬俑、華清池、大小雁塔古蹟連在一起。這種場景很矛盾，也很真實。」在西安期間，他還拜會了鑽研陝北民間藝術的學者，陳山橋、李紅軍，向他們請益陝北剪紙人的資訊。

走進濡慕已久的陝北，吳耿真從延安、到安塞，至綏德、洛川，為了尋找某位剪紙技藝精湛的老婆婆，常得獨自徒步到荒涼的山村。所幸這一路上，吃住並不成問題。問他有事前的規劃嗎？他回答，「沒有。這段時間就是借住當地人家裡，與他們同住窯洞，同吃穿。之後，再請他們介紹到另一戶值得探訪的剪紙人家。」

對吳耿真來說，陝北高原的生活是一種身體的歷練——餐餐吃饅頭、饅饅和榨菜，飲水喝

的是雨水，如廁只能到菜園，天冷時便窩在炕上取暖。不過，精神上卻是種沐浴，「每天都能欣賞不同剪紙的壓箱寶，或聽老大媽說人生故事，陪老大爺抽菸消磨時間。」

有時不免聽到不義的故事。一生都寄託在剪紙的鄉下老太婆，被當官的欺詐，作品被充公、販售、私藏，她們卻只能得到微薄的回饋，甚至有的還分不到一分錢。他也就跟著傷感起來。

雖然這次流浪的目的是為了「剪紙」，但出乎他意料外，陝北民間藝術的多樣化，不僅止擅於剪紙，還包括刺繡、泥塑、版畫、石雕、捏麵花、皮影戲等，愈是偏僻荒涼的地區，這些文化保存愈生動完整，愈純粹。他深刻地體認「艱難生活中所淬練出的藝術力量。」

且這些民間藝術，完全與現實生活緊緊連結著。他說，「陝北的剪紙不只有裝飾之用，紙上剪出的人物或圖騰還蘊含許多值得玩味的故事，例如，可用來趨邪、治病、節慶。貼在炕上的是灶神，貼在門上就成了門神。」透過這些常民藝術，讓吳耿真學習到「原來最動人的美，都隱身在俯拾即是的生活裡。」

透過流浪壯大眼界 回到自在創作的人生

在陝北窯洞生活一個月後，他輾轉流浪到絲路，隨興去了嘉裕關、敦煌石窟，甚至遠到甘南地區：藏族的拉卜楞寺、蘭木寺。沿途舟車勞頓，「常常累了就睡在火車的走道」，但那蒼茫的自然景觀與古老建築，「就那麼牽引著，感動著我，一次次壯大我對生命的眼界。」

十二月流浪歸來，吳耿真即面臨了大學畢業後的經濟與就業壓力。雖然他擁有剪紙、攝影、寫詩、裝置藝術的專長，不過卻還沒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。他說，「這次流浪，讓我更堅定地想走在純粹創作的路上，不想做迎合他人的藝術，也不輕易向現實利益妥協。」

他攤開了在旅程中特地「揹」回來的各式紙張，彷彿又回到最初那個自在創作的自己，準備細細地剪出心中那片森林，也準備細細地品味「長大」的人生。

（文／謝旺霖）

從揚棄自我的旅途中再尋回自我

流浪印度的編舞家鄭宗龍

鄭宗龍，雲門基金會第二屆「流浪者計畫」獲獎助者，他是雲門舞集 2 的特約編舞家。問起這位年輕編舞家申請「流浪者計畫」的緣由，他不禁有點靦腆，因為之前就申請過一次，慘遭淘汰。他說，「這可是賭上面子，才又硬著頭皮來的」而「想去流浪，不為尋索什麼，只是為了卸下長久以來偽裝的盔甲。」

自認對念書毫無天份的鄭宗龍，國中因好玩鬧事，屢屢成為人家眼中的問題少年；高中畢業後，勉強擠上台灣藝術大學夜間部，白天便開著貨車到忠孝東路擺地攤賣拖鞋。直到大二那年，在一場演出遇到了已故舞蹈家羅曼菲，將他拉拔進台北藝術大學，才啟發他舞蹈的長才。



鄭宗龍與印度的孩子合照

不到三十歲，鄭宗龍在舞者或編舞的領域，就比同儕獲得更亮眼的成績。他後來轉考上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，一畢業便成為雲門舞團舞者，演出過「行草」、「行草 貳」、「薪傳」、「水月」等經典舞作。四年後投入編舞工作，作品「彼此」旋即獲得德國路德維希港劇院第一屆國際青年編舞比賽第三名，同年更應雲門舞集 2 之邀，為「春門 2006」公演編創舞作「莊嚴的笑話」。

舞蹈之路的掌聲與名聲，同時也伴隨著世俗的制約。這段期間，鄭宗龍敏感地意識到自己的改變，基因裡似乎總有種浪子性格，時不時牽動著他想去找尋一個最真且自由的自己。「但，原本的『自己』又是什麼？」他沒有確切答案。想到印度流浪，「正是想一路丟，看看最後剩下些什麼，去認識一個真正的鄭宗龍。」

被騙至喀什米爾，意外經驗山居生活

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，凌晨兩點半，鄭宗龍抵達德里。隔日睡醒，四目望去盡是破舊的屋舍，滿地的動物排遺，他才發現自己已遠離了城市，「置身彷如伊拉克戰亂的廢墟中。」不過，似乎就在這種沒有虛飾的破舊之地，「輕鬆的自己開始冒了出來。」

他迅速適應當地環境，輕易就跟路邊的攤販打成一片，甚至開起玩笑，「無聊到還會相互誇張玩起『摸老二』的遊戲。」這種親暱、輕鬆的人際舉止，讓他暫時不用再去顧忌台灣都市生活的種種，僅僅開心地享受當下生活就好。

但過度的不設防，卻讓鄭宗龍到印度第二天就受了大騙。一位假裝大學生的年輕人向他搭訕，說要帶他去好玩的地方，最後竟輾轉騙他到印度北方至今仍與巴基斯坦有國界紛擾的

山區喀什米爾。

在喀什米爾一個禮拜，他藉著比手畫腳和零落的英語與當地人溝通，住過湖上的船屋，也住了山上貧窮的牧民家。他反而說，「沒想到因為受騙，才有機會親近曠野，每天沿著湖散步，爬上山午睡、曬太陽，往往一覺醒來，山谷間竟神奇地滿佈著羊群和野馬。」這場因騙局導出的意外旅程，竟成為他整趟流浪最美好的體驗。

返回德里，他決定不再倚賴他人，讀著旅遊手冊，往南到古城齋浦爾（Jaipur），選最便宜的旅店、吃最便宜的食物、坐最便宜的火車。在南印度果亞（Goa）海邊，他獨自渡過三十歲生日，那天他為自己許下唯一的心願——戒菸，藉此來砥礪過去絕少堅持的自己。

菩提樹下參悟，學習修剪身心雜蕪

「每天給自己一點往前移動的壓力，不移動就好像沒有進步。」接著一個月，他走訪古蹟和村落，從孟買到科欽再往北走，幾乎繞行整座印度半島。十一月底，抵達菩提迦耶。他一看見釋迦牟尼佛曾經修行的菩提樹，「也不知為什麼，竟莫名感動地哭了。」

旅程中身體都安然無恙的他，此時卻生了一場大病，上吐下瀉，但他仍堅持拖著孱弱的身軀，連續七天到菩提樹下報到。他說，「菩提樹下有股獨特，龐大寧靜的力量，讓我滌洗思慮，開始釐清編舞對自己的意義和責任。」菩提樹下參佛，讀釋迦牟尼傳，但卻莫名在此成為一位無神論者，得出一個啟示，「一切的混亂和痛苦都源自於心，凡事只求認真對自己交代。」

在北印，他去了瓦拉納西觀看印度獨特的火葬儀式，「那簡直是一處偉大的人間劇場，站在那裡人瞬間顯得微渺。」旅程的終點，到了泰姬瑪哈陵，他再次流淚。因為，「從來沒有走過如此漫長孤獨的旅程，且每到一座城市不免都是懷著不安與恐懼的心情」，而這種種全憑著意志克服過來，他說，「這次的眼淚，完全是為自己而流。」

流浪印度六十一天，鄭宗龍變得更清瘦，也更清澈。

這段「一路丟」的旅程，也讓他一點一滴地「撿」回徬徨的自我。把自己比喻為一棵樹，現在的根已紮穩了土地，流浪讓他懂得，「坦然地卸除身和心上的盔甲，並透過各種角度的轉換，時時修剪自己雜蕪的枝葉，與自我對話，也檢驗自我的極限和能耐。」

（文／謝旺霖）

越南新娘群裡的流浪

用鏡頭學習尊重不同族群的張政緯

跨國婚姻的仲介，已成為部分台灣男人擇取新娘的方式之一。走在路上，總不時可見外籍新娘仲介所打出「包處女」、「包君滿意」、「落跑賠錢」的廣告標語，儼然把那些自開發中國家嫁至台灣的女性，當作「商品」看待。隨著這現象興起，社會上於是也有不少學者和社福團體開始關注這個議題。

二〇〇五年五月，張政緯應《商業週刊》邀請赴越南，拍攝「湄公河畔的台灣囡仔」紀錄短片。雖然這場拍攝過程只有七天，但卻觸及了不少失婚、受虐的越南新娘與她們小孩歸返越南後的生活窘境，同時還深刻探討台越聯姻底下的這群孩子，在國籍和教育上面對的難題。



張政緯與受訪者合照

那場經驗，對張政緯是極大的文化震撼。回到台灣後，他便開始積極著手一系列台越婚姻的案例研究，並醞釀發展成另一部紀錄片，作為他台南藝術大學音像記錄研究所的畢業作品。二〇〇六年，他獲得雲門基金會「流浪者計畫」獎助，也是以越南拍攝為主題。

花錢「買老婆」 鏡頭後的掙扎

來到胡志明市頭一個月，他每天都在街上或咖啡店，覓尋跟嫁到台灣當新娘有關的人，和他們打交道、搏感情。為此，荷包得經常「失血」，他說，「那些越南人，老是藉機要我請吃、請喝的。不少錢就花在交際應酬上，真心疼！」

為了多省點錢，好用在硬體設備及請人翻譯，張政緯吃住都只能找最便宜的，還在當地買了一輛四十年的老摩托車（約台幣六千元），以節省交通費。他笑稱自己「簡直比當地人更窮。」

除了在市區，張政緯也走入鄉間尋訪拍攝對象。他發現越南女子「下嫁」到台灣，已經成為一種風潮。儘管已表明來意，農村裡的人常會誤以為他是來娶老婆，把他拍攝的理由，當成是不好意思啟齒「找老婆」的藉口，還是紛紛引薦未婚女性來「認識」他。

問她們為什麼想嫁給台灣人，幾乎千篇一律的回答：「台灣人很疼老婆、很會賺錢」。張政緯有時會加以反駁：「台灣也有很多人很窮，而且還會打老婆。」但即便知曉這類訊息的人，仍寧願只相信那是特例，或歸咎於「是那些女孩自己命苦！」

在駐胡志明市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，張政緯認識一位三十三歲到越南娶老婆的台灣人，他幾乎參與這位新郎，從面試到迎親的過程，短短幾天，「我看到他十八歲的老婆，千方百

計地向他要錢。討不到時，竟會罵他說，沒錢幹嘛娶老婆」，而「那男人只能暗地裡吐苦水說：幹！開攏開啊，先帶回台灣『生仔』再講吧！」

「難道越南新娘嫁到台灣只為了錢嗎？」「難道台灣男人娶越南新娘只為了傳宗接代？」再加上看到現今越南官方面談審核「用錢通關」的文化，彷彿活生生的官場現形記，使他拍片的過程，內心總充滿著矛盾與拉扯。

放下紀錄片作者的成見 讓鏡頭訴說自己的故事

從學拍攝紀錄片以來，張政緯一直謹記紀錄片的核心價值「關懷弱勢」，這也是大部分拍紀錄片的導演會自許挑起的責任。他一面拍，一面處理腦中的疑問，找了許多案例比對：台灣官方的觀點，研究跨國婚姻的越南學者觀點，娶妻後在越南定居的台灣人觀點，試圖逐項解決困惑。

但衝突的問題只是越來越多。那種唯利是圖、完全沒有情感基礎的婚姻關係，他越是分析，越是質疑，常常「不知該怎麼再拍下去。」直到他放下自己的成見，透過實際生活的反省，學習接受她們的聲音。

「紀錄片值得玩味的地方，就是你永遠都沒辦法預測鏡頭下的對象會說出些什麼。」從原本的反感到抗拒，到後來認真學說越南話，張政緯才真正融入另一種異質文化的觀點與生活調性，「把自己的心放柔軟後，才恍然得到更多體悟和自由」。

從一位在台灣娶越南老婆，後來定居當地的黃老先生的拍攝過程中，張政緯體會了，「原來越南也可是台灣人的家，原來慢慢培養也會成就一生扶持的情感。」

換了一種觀點生活，他也發現越南人也並非全然那麼「愛錢」。他們可愛之處在於，「剛開始，總會想盡辦法『坑』你，可一旦成為朋友了，他們也會樂於『請客』。」甚至還有越南朋友打國際電話到台灣，邀他再回越南作客。

這趟越南之行，足足有三個月之久，但回台後，紀錄片尚未拍完。他還準備著手拍攝，那些越南新娘在台灣的情形。如何串連起現在與過去，影片剪輯的後製過程，正是他另一場流浪的開始。

回想起越南的流浪，張政緯說，「真的擴及了自己的地理文化和生命視野，更讓我懂得去尊重不同國度裡人們的想法。」打算用紀錄片作為一生職志，張政緯希望藉著鏡頭下傳達的影像紀錄，喚起更多人對不同社會角落裡的注意和關懷。

（文／謝旺霖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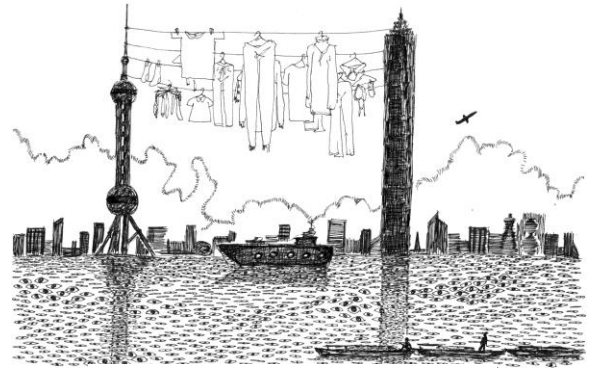
星巴克照見的華麗與蒼涼

隨著咖啡香流浪的許育榮

應該沒有另一個雲門「流浪者計畫」的申請者，會提出從咖啡館出發，來畫上海。

當許育榮第一次參加「流浪者計畫」，並意外入圍時，他顛巍巍地半坐在椅邊上，屏息聽著他的作品和計畫案，被三位評審快速審閱的聲音。靜默了數分鐘後，終於——有一位評審率先發問：「既然你喜歡『老』的氛圍，為何不乾脆留在台灣畫畫台南就好了？」
「唔…也是。」被問傻的他，果然落選了。

隔年，他又再次鼓足勇氣，提出同樣的計畫。但這一次，或許是滿滿單純且真誠不放棄的信念打動了評審，終於，使他在「流浪者」重重的甄選中脫穎而出。



許育榮的插畫作品／上海

許育榮，30 歲，學土木工程，愛作畫，在咖啡館工作

許育榮生長於擁擠的三重，在喧囂的台北工作。但他在宜蘭和屏東念書的那七年，除了土木工程學練就他嚴整的線條美學，長期浸潤在自然原野自學自畫的生涯，更讓他的筆觸在紀律之外，多了一種故事性和感情的特質。

學土木工程的許育榮只是跟著自己的感覺走，在所學的專業界線外獨自地畫著，直到獲選雲門第二屆「流浪者計畫」獎助金，才「彷彿覺得自己真的成為了青年藝術家。」這樣的肯定，更堅定他想要作畫的信念。

二〇〇六年，春初，許育榮辭去工作，拖著旅行箱，夾著畫袋，獨自踏上他這輩子第一次的海外旅程。

曾在台灣 STARBUCKS(星巴克)工作三年的許育榮，選擇上海 STARBUCKS 做為流浪「出發」的起點。STARBUCKS 連鎖咖啡館不管開在哪，長得都一樣，這種異地裡的熟悉讓許育榮在 STARBUCKS 彷彿有一種「家」的感覺，讓他在面對上海人各種形色的「冷漠」，或孤身異域的旅途上，不慌不怕。

STARBUCKS 同時也提供了他一個「放心」的環境，使他可以冷靜地沉澱、思索，每日旅途上的經歷與衝擊。儘管處身繁華的世界，他筆下的上海，反倒呈現了那些吊掛在重重摩天樓下的「衣服」，那一張張「歷經華麗卻又蒼涼的手勢」。

許育榮：旅途上與人相遇竟也是那麼重要。

除了 STARBUCKS，許育榮也四處作畫，深入上海巷弄。起初畫到腳酸了，想跟鄰旁的大嬸借張板凳，幾乎都吃閉門羹，到後來當地人不僅會遞張板凳給他，甚至開始與他話家常。他說「撇步」是：自己絕不能先主動開口。只要待久畫久了，提供鄰人觀察他的機會，他們自會卸下心防。「就這樣靜靜地畫，有些人就會靠過來。畫畫，讓我拉近了，人與人之間的空隙和距離。」

為了更貼近當地人的生活，許育榮刻意選擇住在外灘附近的青年旅館，因此結識許多大陸內地各路來的「好漢」——有找工作或找不到工作的，或被迫離鄉打拼生活的年輕人，他們身上似乎總有道不盡聽不完的辛酸故事。

當然，青年旅館也不乏有那些與他同樣熱愛上海的異國旅人。他們交換旅途上的見聞，豐富了彼此的生命經驗。某日，一位日本朋友要回國前，特意拉他到黃埔江畔，要他把眼睛閉上去傾聽迴旋在江岸間的汽笛鳴聲。突然，他才頓悟般的領受到，「原來，這城市除了用眼『看』，居然還有一種用耳『聽』的方式，甚至更多。」

畫袋被偷不氣餒

不僅在上海，許育榮還「流浪」到昆明、大理和麗江。但剛到昆明，意外卻發生了。

他好不容易在滿山人海的昆明火車站排隊買到大理的火車票，一回頭，竟發現自己的畫袋不見了，使得他接著到大理和麗江的行程，興致與注意力都被打亂了。許育榮說，到現在仍無法對畫作被偷的事釋懷，不過，這反倒激勵他重回到上海更努力作畫，把曾經失去的一切，用腦、用心的重新「畫」回來。

流浪歸來，許育榮帶回自己第一次出國的勇氣，帶回一路上遭遇的情誼，以及一堆充滿故事線條式的畫作，他引了「藍色大門」電影裡的一段話，似乎給了自己一個註解：「但…總是會留下什麼吧！留下些什麼，我們就會變成什麼樣的大人。」

他形容自己這次除了畫畫外，彷彿也是為了「思念」著某個人而走。因為走得遠了，回歸後，才發覺自己看得更近。下一回，許育榮自信滿滿說，要創作屬於自己土地上「咖啡館裡的故事」。

（文／謝旺霖）

印度再生之旅

捕捉人間風景的陳眉伶

「黑烏鴉與白烏鴉」是敘述一群「歐巴桑們」在傳統手工工廠裡，辛苦奉獻了大半輩子，仍不免隨著現實社會的發展而逐漸凋零隱沒的故事。這部紀錄片，是雲門基金會第二屆流浪者計畫獲獎助者陳眉伶，在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的畢業作品。只不過她說：「這是一部未完成之作。」

二〇〇三年，陳眉伶的父親因心肌梗塞在家驟逝。那天，只有她與父親在家，之前還與父親閒話家常，沒想到才洗個澡出來，父親已毫無氣息。對於自己沒有再與父親多說些話，或許能挽回父親一命，陳眉伶始終懊悔不已。這部因父親居中牽線，以父親任職的工廠為主題拍攝，費時一年完成的紀錄片，在殺青剪輯後，一向最支持鼓勵她拍片的父親，卻沒有機會看到了。



瓦納拉西的恆河日出

父親過世後的那兩年，陳眉伶除了在山區擔任特殊教育教師的工作外，幾乎把自己「關」住，影像創作全然停滯。在失去父親的陰影籠罩下，她經常自問：「人生有何意義？」想著，「人生只是一直走向死亡的過程。」

「自從父親逝世，不知怎地，就一直想去流浪。」雲門基金會的「流浪者計畫」可算是推了陳眉伶一把。她原本計劃到印度拍紀錄片，希望在那充滿神話，巨大的古老文明面前，體會自己的渺小。沒想到這一趟流浪下來的結果，卻大出她的意料。

活在動物與骨灰包圍的世界裡

陳眉伶原以為憑著過去拍攝紀錄片的經驗，足以讓她去適應各種弱勢階層的處境。但等她真正到了印度，才驚覺自己的天真，她形容：「這次流浪根本是一場『生存』之旅！」一下飛機，她馬上受到當地計程車司機的圍擠。本來計畫在首都新德里住下，待熟悉環境後，再轉往他方。不過，在到處重重人潮的包圍和陌生的驚駭下，讓她一刻也不敢停留，「逃」上火車直奔阿格拉—泰姬瑪哈陵所在地。

她從新德里到阿格拉，再到印度最古老「聖城」之稱的瓦拉那西，三天奔赴六百多公里。這幾個北印度貧窮城市，牛、羊、猴子、人全都混雜在一起，她說：「彷彿活在動物的世界。剛至瓦拉那西的幾天，我幾乎是『躲』在旅館裡，不敢出門。」

待在旅館，也不能平撫文化的衝擊。她所住的房間門窗，一打開，就正對著火葬場，三不五時便撞見屍體來來往往運送，即使想關窗，眼不見為淨，火葬場焚燒的塵灰，仍會滲進屋內，行李每天必會覆上一層厚厚的「骨灰」，迫使她不得不再另覓住處。

在外遊走幾乎都是繃緊神經，她時常得面對商販刻意對旅客哄抬物價；更糟的狀況是，只要稍不留神，就會被當地熱情過度的男人「吃豆腐」。陳眉伶說：「剛開始，還以為是文化認知的落差使然。」後來，據有經驗的外國旅者相告，才知道：那些跟她搭訕，想陪她 Shopping，邀她喝咖啡，甚至願意租借她整層便宜公寓的人，其實全是因為看上她是「一個人」，想藉機佔她「便宜」。

那個舊的自己『死』在印度了

流浪半個月，她就已經想放棄這場意外艱苦的旅途。

陳眉伶說：「在瓦拉那西生一場大病，拉肚子拉到脫水，躺在床上好幾天，以為自己快『死』在印度了。」但偶然間讀到旅遊書上，一處 KUSHINAGAR（佛陀圓寂之地）記載的一句話：「你所忍耐的苦難都必會過去，並得到拯救」，她便決定再撐一下，去尋找那啟示之地。

也不知道是那句話的鼓舞，或是佛陀之地的影響。她說：「儘管去那裡還遇上大淹水。不過，一股莫名的力量，就讓我開始習慣印度的生活。」她重回瓦拉那西，再也不在意鞋子和褲管在路上黏了多少大便；甚至從舒適的旅館搬出來，向當地民家分租一間小房，儘管住的品質與安全都較低，每天還會不定時斷電五、六個鐘頭，她仍是甘之如飴。

真正『住』進印度的生活後，她開始每天等候在恆河邊拍攝當地人「拜河」的儀式，學習靜觀『生、死』，進一步體會，那麼多祭典儀式的舉行，其實是為了連繫人與人間的感情，神話不只是遙遠的眺望，而是切身幫助自我省察和延續生活的力量。

再生後的人間風景

在瓦拉那西停留四十天後，在最熱的八月，她預計啟程到印度西部第一大城孟買，但半途，孟買的火車竟發生爆炸事件，讓她臨時改道往南印度的科清、清奈等地。不過考驗仍未結束，她在南印度的旅程，又生了一場大病，又被人「吃豆腐」，可是她這次並不被任何挫折影響，而堅持走到印度最南端的兩大洋交會處，為流浪劃下暫時的句點。

陳眉伶說，「此行最大收穫是心情上的轉變。」雖然流浪期間拍攝的影像紀錄，不若以往那麼有目標、結構，但透過這樣單純地注視，竟掙脫了許多以前拍片時內心加諸的限制與衝突，轉而明白「人間處處是風景。」現在創作對她已不再是個問題，而是「順其自然地想拍就拍，即使拍顆小樹也沒什麼不可以。」

（文／謝旺霖）

在偶中，發見另一個自我

和偶一起流浪的薛美華

「偶」是我？亦或，我是「偶」？

漆暗的場景，橘黃的燈，聚照在那平躺靜止的偶，隱隱的流光映現著那偶背後若有若無的人影和表情。操偶者利用幾根懸絲或撐桿，

帶動著偶在三度空間中浮游，讓它知覺，讓它行動，讓它說話，演繹生命。看似人在操縱偶，但有時卻是，人偶合一，人隨偶走，抑或在冥冥裡，那操偶者的背後隱藏著一張更巨大操縱的手，牽引人去舞動著偶，與偶共舞。



印尼的皮影戲偶

十四年前因看到德國偶戲「蛀牙蟲流浪記（ Karius und Batus ）」演出，才有今天的無獨有偶劇團導演薛美華。雖然那只是齣教育兒童牙齒保健的布偶戲，但操偶者不僅一人包辦所有角色的操作，更身兼導演、舞台、燈光、音效等技術，這讓初初接觸現代劇場的她，佩服得目瞪口呆，且啟發她投入偶劇教學與劇場工作。而這一投入，便是不分晝夜的十數年。

但 2005 年，有一天正在洗臉的她，望著鏡中塗滿泡沫的臉，竟感覺那是另一個人，或說更像個被忙碌生活操縱的「偶」。突然間，她意識到過去在劇場的工作，泰半都具有目的，並非純粹為自己而學習。這樣的覺察，使她重新萌發了 蟄伏心底已久的 「流浪」想法。

2006 年春初，因雲門基金會「流浪者計畫」獎助，薛美華終於放下忙碌的工作，飛向爪哇島中部的梭羅——那個林懷民老師所說 的，印尼藝術文化的重鎮——但在她想像裡荒涼的只有「雙手吊著兩只蛙鞋，僅能光著腳踩沙灘的小島。」

常常練到累得睡去，惡夢連連

飛機一落地，薛美華立即投入印尼梭羅藝術學院〈 STSI 〉的操偶課程。已在台灣學過不少操偶技術的她，原本充滿信心，可是當面臨印尼 古式 戲偶對白與唱詞的學習時，她便陷進鴨子聽雷般的痛苦 。即便後來，將焦點集中在操偶技巧， 但獨特的操偶術，仍讓她吃足了苦頭。

印尼傳統偶和一般杖頭偶、皮影偶不同，特色是雙腳固定不動，著重手及頭部動作的細膩呈現。操偶師通常一手得拿著三根撐桿，一根拄著身體，另兩根負責偶兩手的活動。有時在轉換動作或同步操作多偶時，支撐偶身體的桿子須插入以香蕉樹幹作的基台上，且手的力量得拿捏得恰到好處，否則，太小力會固定不住，太大力又拔不出來。不過她覺得最「恐怖」的是，每當那被刺入的樹幹孔縫中流出濃稠的汁液時，就會招來成批大頭蒼蠅黏人的騷擾。

為了想在行程預定的兩個月內，學好基本操偶，她每天在學校上完固定的課程後，私下又請了一位杖頭偶和一位皮影戲的「家教」，就連獨處時也要求自己再多練習數小時，常常練到「累得睡去」，甚至「睡覺都夢到自己在練習而醒來」。這段辛苦過程，不禁讓她憶起在復興劇校學了八年京劇的時光。「有好幾次練偶苦得想放棄，但想起小時候劇校裡更苦的日子都撐過來了，這點小苦又算什麼」。隔天，她又再度充滿活力地認真學習。

在梭羅的日子，除了辛苦勤練，薛美華也活出了生活的樂趣。

像剛開始她十分排斥用手扒飯，鼓起勇氣嘗試後，卻逐漸愛上這種進餐方式。她現在非常同意當地人所說，「用手，會讓食物變得更好吃，好吃到連手指都要吃了下去。」也許是入境隨俗的寬心，身體一向不好的薛美華，這次居然「一叢好好（台語）」，一點生病的徵狀也沒有。反倒是許多外來旅客，卻感染了瘧疾或「骨頭感冒（類似感冒全身無力的症狀）。」觀賞長篇史詩的偶劇，則是薛美華晚間最大的娛樂。戲總在晚上八九點開鑼，且往往一演出就是七、八個小時。當地人或坐或躺，看得很隨興，看到睡著，醒過來又再接再著看。「看累了，我常跟著小睡一下」，她享受地說。在梭羅，藝術像家居生活般自然。

她也跟著梭羅人培養出一種意外的耐性與步調。縱使走錯了路，坐錯了公車，也不以為意。偶爾興致一來，就當個探險者尾隨某位佝僂的老太婆，走到一個根本都不知是哪裡的他方。有時，甚至還引來一群小朋友陪伴著她一同走路，找路。那每天的奇遇，「幾乎讓我都是微笑著出門，微笑著回家。」

驚遇大地震，「承認」自我的不足與懦弱

2005年5月27日清晨，爪哇島發生芮士規模6.2級的強震。梭羅當地雖無重大傷亡，但在距離梭羅約一個多小時火車車程外的日惹，死傷卻已達四千多人。她讀到新聞當下，原想投入災區盡微薄之力，但最後卻因「不敢目睹」且「沒有能力」接受那般慘狀，因而怯步。

對於當時身在爪哇，竟沒能如台灣九二一大地震時，立即果敢前往災區服務，薛美華至今仍懷著些許的「抱歉」。但這也讓一向獨立生活，自以為十分堅強的她，了解「換到一個真正陌生的空間後，原來自己竟如此膽小。」

藉由「流浪」，薛美華承認了自我的不足與懦弱，也重新找回對劇場的熱情。現在的她，不僅思索著如何借戲劇之力為台灣社會做更多的事，也積極籌劃下一次的「流浪」——學習台灣傳統偶師們即將凋零的技藝。

（文／謝旺霖）

在廢鐵中粹鍊的鋼雕藝術家

達比烏蘭·古勒勒流浪到日本

屏東縣北側的三地門鄉，位處中央山脈南段與西部平原的交壤地帶，自古以來便是排灣族人的所在地。如今，那裡不僅是著名的觀光景點，還匯聚許多排灣族的藝術工作者，在這塊土地上耕耘著各種富饒人文意義的創作。達比烏蘭·古勒勒——第一位獲選雲門基金會「流浪者計畫」的原住民——就住在三地門。



古勒勒在日本創作的鋼雕作品

即便在三地門，古勒勒也被當地排灣族人視為「奇特」的藝術家。二十八歲時，他才毅然結束十年軍校的生涯，開始投入雕藝領域。除短暫曾向同為排灣族的藝術家撒古流·巴瓦瓦隆學藝外，他大多憑藉著自己摸索，創作媒材從木頭、石頭，還擴及到其他族人藝術家不曾使用的鋼鐵，而令人驚訝的是，其中這些鋼鐵多來自解剖的廢棄車體。

他認為，原住民藝術創作不該侷限在「傳統手工藝」，他的雕塑跳脫傳統圖騰的摹仿而走向純粹的線性設計。如此積極求變的精神，讓他從事創作不到十年的功夫，便獲得第一、二屆原住民木雕首獎及木雕金質獎。連獲大獎的古勒勒，並不就此認為自己的成績超越其他藝術同儕，反而謙虛地說，「原住民身分給我的是『自由』的養分，而非文化的包袱。」

流浪，是更專注地「創作」與享受美學的「觀禮」

二〇〇四年古勒勒受邀在高雄「國際鋼雕藝術節」進行鋼雕 Live 秀，與另外五國的八位鋼雕藝術家彼此交流。其中，日本鐵雕家高田悟（Satoru Takaka）天馬行空的創作手法，啟發他對雕塑的想法。因此，二〇〇五年申請雲門基金會「流浪者計畫」時，他只有一個念頭——去東京找高田悟先生。

東京的消費高，原本令古勒勒很擔心錢不夠用，所幸獨身的高田悟先生將自己的居處兼工作室供他借住，不僅解決了他大部分食宿問題，讓他更可安心地投入學習與創作，並在創作上給予即時的指導。

在這位六十三歲的日本藝術家面前，古勒勒原以為自己會像個小學生，得經常受到老師嚴格的指正，可是出乎意料的，在許多的藝術經驗上，他總是獲得讚賞和尊重。儘管彼此只能透過「破」英文與漢字溝通，但他說，「語言對藝術從來不是問題。因為想說，想表達的，幾乎都可借助藝術的演練行動來說明。透過交換創作經驗與觀念，我從這位大我二十多歲的長者身上，得到充分的肯定。」

除了在工作室裡規律地創作外，高田悟引薦古勒勒參觀眾多美術館和藝術家工作室，也讓他彷彿進行了一次次的醍醐灌頂。古勒勒認為對藝術工作者來說，「日本真是個非常『棒』的國度，藝術館之多，類型之繁，精緻化的程度，都令人讚嘆不已。」

他對大阪博物館的印象尤其深刻。當時他看到博物館前衛的建築造型，以為那絕對是位年輕藝術家的傑作。結果在另一座美術館巧遇設計師山口宏森，才驚訝那位前衛作品的構思者，竟是個七十多歲坐在輪椅上的老人。他著實大吃一驚，「日本現代藝術家自我充實之『快』，實在值得台灣學習。」

本來只計畫在日本做一件創作，但這趟流浪他卻大有斬獲地完成三項作品：原點、廢鐵堆裡的聲音，和 Up Sailing Down。雖然這些鋼鐵之作，因為運費昂貴沒能運回台灣，而留在高田悟先生的工作坊。古勒勒毫不惋惜地說，「最重要的是把腦海裡吸取的觀念帶回來。」

從疏離的生活中，看見廢鐵堆裡另一種美

歷經觀摩和學習，古勒勒說，「雖然日本藝術的形式既多且美，但總感覺他們的藝術家在創作上『離開自己的土地太遠了』，未能確實掌握母土的『愛』的精神。」他還認為，「日本多數藝術家都較為冷漠，相較之下，對土地的熱情，就是台灣藝術家的資本。」

二〇〇六年三月出發，五月歸來，古勒勒就開始積極地籌備個展，以「一個箭頭，一個問號」為主題，七月在「佛光緣美術館」，九月在「嘉義南華學館」展出。他若有所思地說：「就是不知道往哪裡走，才開始去尋找。」與過去習慣總為自己規定主題才開始創作，返台後的古勒勒說：「現在是主題自己找上我。」

回溯這趟日本行，「最大的助益是幫助自己找到一個『放空』的機會，而『放空』正是為了再躍起下一波的高點」。流浪時，「腳離開了自己原本的土地，雖然感覺踏得不是那麼紮實，卻體察一種疏離『觀看自己』的方式。」因為離開，做了異鄉人，更發覺自己對於土地的渴切，並重新再定義與創作自己。古勒勒的創作，因為拉出距離，看見廢鐵堆裡另一種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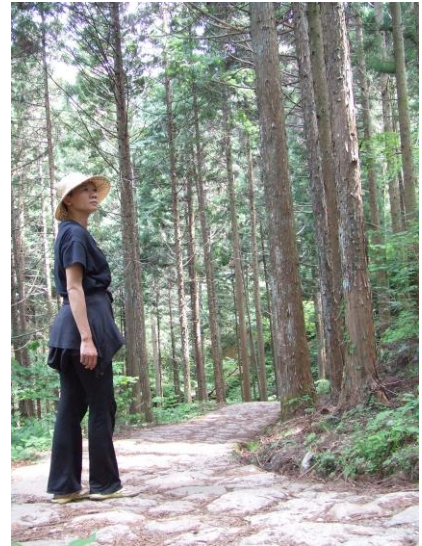
（文／謝旺霖）

穿梭在京都古寺間的劇場僧侶

「行腳」日本的吳文翠

一雙夾腳拖鞋，一件寬口大褲，搭著褪色但潔淨的T恤，光頭素顏。如果不特別說明，實在很難想像，眼前這位「尼姑」般打扮的人，竟是「梵體劇場」的藝術總監——吳文翠。

從一九八八年加入「優劇場」，到九四年她獨自成立「極體劇團（現名梵體劇場）」，近二十年來，吳文翠的生活沒有一天離開劇場。她笑著說：「這個劇團，也不過三個成員而已。」一語不僅道破了台灣多數小劇場，在經營上「校長兼撞鐘」的艱辛，也顯現出她對劇場的熱愛與堅持。



京都古道行腳的吳文翠

全心投入劇場的結果，讓吳文翠在二〇〇〇年時，無奈地結束了一場十年的婚姻。但儘管處於離婚後的低潮期，她仍繼續堅持作戲。二〇〇一年，她旋即發表以個人淨化儀式為主的《白鬼》。到二〇〇四年，又發表了象徵宿命和愛的《蛇，我寂寞》。但連續幾年的創作淘空後，她的心似乎也空了，不得不暫時停下來面對感情與經濟上的窘境。她質疑著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一度想放棄劇場，甚至脫離人世。

就在此時，雲門基金會「流浪者計畫」的出現，彷彿是她尋求出口的一項契機。她以前往日本行腳「古寺和學習「舞蹈」的計畫，獲選第二屆「流浪者計畫」專業組的成員之一。

「行腳」，是自我的捕捉與對話過程

說是「行腳」，但這趟流浪，並非以哪個地方做為始點和終點，吳文翠只是「借用了日本這個『場所』，來進行自我淨化的精神之旅。」

流浪期間，她大數待在京都和奈良。每日固定行腳六、七個小時，兩個月下來至少參訪了日本六十多座大大小小的古寺和林園建築。

她「就這樣一個人走，不為什麼而走，純粹只為了走路而走。」然而長時間面對孤獨無力的自己，有時會使她不禁自問：「我迷路了嗎？」「為什麼還要堅持走？」「究竟該在哪裡停下？」同時她也思索著自己長年與戲劇的關係：「我是否也能像這樣持續地走在戲劇的道路上？」她一邊走，一邊試著將自己一分為二，釐清思路，引導自己走向出口。

吳文翠說：「這種不斷地行走，就像每年隨白沙屯媽祖日夜不息的徒步進香一樣疲累。但跟著媽祖繞境，身旁隨時有善良的信徒們相互提攜打氣，給你走下去的力量。」她一次次在

街道商家的玻璃鏡前，看見自己映出的模樣。拿起相機「自拍」，透過不同的角度和光影，觀視、凝看，藉此「感受『我』每天的存在」。看見自己正在行進間的身影，彷彿能令她感覺「沒有任何一條路是走不下去的。」

流浪京都的日子，吳文翠都住在一間名為「東寺庵」的 Guest House。那裡除了住宿費便宜，最大的特色就是，免費無限量提供各種酒類和零食。跟她同寢室，已經周遊列國的室友們說：「再沒住過像這樣一處免費供酒的地方。」她白天行腳，晚上就邊喝著啤酒邊寫作。藉由寫作，她也發掘了另一個自我，逼視自己回頭檢視過去的種種生活。

這段日子，簡單卻很深刻。「因為屏除很多經濟和生活瑣事的干擾，剩下的，就是自己最真實的聲音。」

回歸身體的場所，達到身心的淨化

儘管日本特有的「舞蹈」身體劇場藝術的觀摩學習也是這次流浪的行程之一，但吳文翠並沒有特意去造訪或學習任何日本當地的舞蹈宗流，而是借用了在日本「行腳」的場所與步履間，反覆思考著自己曾多年習得累積的舞蹈經驗，問自己：「我的舞蹈是什麼？」

這個問題的答案，很快就得到解答。

七月離開日本時，她轉赴新加坡參與「瑪格但蓮娜國際當代女性劇場藝術節」，演出她在二〇〇五年發表的作品《在不斷剝除的路上》。演完，藝術節的舞台監督忍不住跑來稱讚她：「今天表演，很不一樣。充滿感人的力量。」她也覺得自己在表演中的身體，終於有了一種久違的感動與釋放。

從出走到「日本那個場所」，最後再回歸到自己「身體這個場所」。四十一歲，這一段樸實的「行腳」和「古寺」之旅，正如同她「尼姑」般素淨的外表，她踩得自在輕盈，卻踏得深刻厚實。問她，此行最大的收穫是什麼？她說，「重新獲得了一些持續做事的力量。獲得了什麼，也許還不具體，但心中卻很紮實。」

（文／謝旺霖）

衷心的感謝

企業及朋友給予「流浪者計畫」的贊助
您的支持將是台灣藝術人才飛翔的翅膀

二〇〇七年捐款者

智榮文教基金會	1,000,000
謝旺霖	3,000
官振鴻	2,000

二〇〇六年捐款者

誠品股份有限公司	1,000,000
郭乃華	1,000

二〇〇五年捐款者

智榮文教基金會	1,000,000
無名氏	50,000
文羽葦	5,000
官振鴻	2,000